



教父學與當代思潮

任卓賢

本院客席助理教授

教父學 (Patrology) 對華人教會及學術圈子來說是個頗陌生的學科。提起神學，我們未必會即時想到有此科目，而且因教父年代久遠，我們或者也會懷疑此科有何當代意義。本文希望釐清這些誤解，向大家介紹傳統教父學的特點，並分析教父學在當代思潮下所展現的新形態。

教父學的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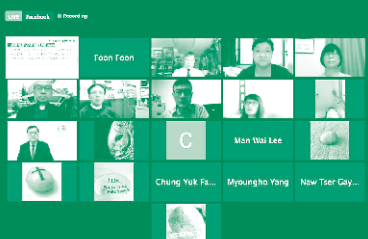
教父學，顧名思義，就是研究教父的學問。從廣義的角度來說，教父學可追溯至二、三世紀教父出現的年代。基督教是非常強調「傳承」的宗教，強調我們的信仰是源於主耶穌基督的教導，然後透過使徒及眾先賢代代相傳，因此教父的見解自早期教會開始一直備受重視。教父就是泛指由第一世紀末至第八世紀教會中的一些傑出領袖，¹ 他們多為主教，但當中也不乏沒有聖職的教會領袖。後一代的教父引用上一代教父的論述，來證明自己的正統性，甚至同代的互相援引，在教父著作中比比皆是。例如奧古斯丁 (Augustine, 354–430) 就多處引用早他百多年、同屬北非傳統的居普良 (Cyprian, d. 258) 來建立原罪論的正統性。² 而耶柔米 (Jerome, d. 420) 更撰寫了堪稱史上第一部教父學文獻——《名人錄》(De viris illustribus)，點評自保羅以來直至他本人的教會領袖，共計 135 人。³ 由此可見，教父們本身就是教父研究的導航者。他們視教父思想為建立信仰傳統的重要元素，透過援引、詮釋、甚至批判，建立起多元的教父傳統。往後的神學家及修士也不斷對教父的著作編修注釋，為後世留下了大量的文獻，成為了基督教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重視教父著作的傳統，一直延綿至中世紀及宗教改革時期。中世紀的神學就是系統化教父思想的嘗試。當時的兩部名著充分展現出這系統化的特徵。經院哲學的代表作之一，彼德倫巴都 (Peter Lombard, 1100–1160) 的《四部語錄》(Sentences)，基本上就是輯錄拉丁教父著作而成的匯編。在沒有任何原創材料的情況下，這書竟然成為了中世紀時其中一本最重要的著作，時人對教父思想的重視可想而知。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1225–1274) 的《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雖然有其獨

- 1 其實教父時期沒有統一的說法。至八世紀是根據 Quasten 的定義，以東方大馬士革的約翰 (死於 749) 作為分水嶺。參 Johannes Quasten, *Patrology*, vol. 1 (Westminster: The Newman Press, 1950), 1。
- 2 可參奧古斯丁早期反伯拉糾主義的著作 *De peccatorum meritis et remissione et de baptismo paruulorum* (論罪債和赦免，並論嬰孩洗禮)。
- 3 有關早期教父文獻的歷史，可參 Angelo Di Berardino, "Modern Patrologies," in *The 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atristics*, ed. Ken Parry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2015), 51–53; Quasten, *Patrology*, vol. 1 (見註 1), 1–5。



校友專訪：Khin Maung Yee Page 04



「在線」結業崇拜 Page 06



泰澤祈禱會 Page 08



院長順利交接 Page 10



基督教研究中心 Page 14

到的見解，但卻也同時用上了大量奧古斯丁的材料，予人將教父神學系統化的印象。而到了宗教改革，教父（尤其奧古斯丁）對馬丁路德的影響是清晰可見的。⁴馬丁路德本身就是奧古斯丁修院的修士，年輕時每天都以閱讀奧氏著作為其中一項要務，⁵而他的《羅馬書講義》更有着奧古斯丁的《論靈與字句》(De spiritu et littera) 的影子。⁶天主教會及馬丁路德對奧古斯丁神學的倚重，使當代著名教會歷史學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 將宗教改革形容為奧古斯丁的恩典論與教會論兩方之爭。⁷

教父學的優點與困局

上面勾勒的教父傳統，說明廣義的教父學可追溯至教父時期，歷史悠久。然而，當代的教父學出現得較晚，第一次用上教父學“Patrologia”一詞的是十七世紀時的路德宗神學家“Johannes Gerhard”。⁸我們也普遍將教父學這觀念收窄至指對古代基督教經典文獻的研究。因此，在上兩個世紀，教父學就是整理文獻的學科，被視為與古典語言學(Philology / Classics)同類。⁹當然，教父文獻研究也涵蓋多個範疇的，包括教父生平研究、文本重構、思想史研究、文獻編纂等等。然而，因着其以文獻為本的性質，文獻編纂就成為了教父學研究的主導方向。事實上，過去百多年，教父學最大的研究成果就是出版了多個系列的教父著作校訂版本，合共多達一千本。¹⁰

文獻編纂是門怎樣的研究呢？我想這對很多人來說是項非常沉悶的工作。文獻編纂就是收集及比對文獻手稿。視乎年代及其重要性，一份文獻流傳下來的手稿數量，少則十多份，多則可達一百份或以上。文獻編纂就是找出這一百份手稿的差異，並要從中找出它們之間的從屬關係，進而對內文不明之處作出合理判斷，最後達至一個具科學根據的文本。可想而知，這工作對原文造詣的要求相當高，而且也非常考驗研究者的耐性及專注力。要編纂一份文獻，花上四五年時間是等閒之事，用上十多年的也常有所聞。有價值嗎？很有價值。我們現有的新約希臘文版文 Nestle-Aland 28，就是百多年文獻編纂的成果，而其編者亞蘭特(Kurt Aland)除了是新約學者外，他同時也是教父學的專家呢。

然而，這些埋首古籍的研究，雖說對學術界能帶來長遠的正面影響，但同時也有着某些局限。第一是給人「離地」的感覺，現代意義感不大。文獻編纂的任務主要是重構古籍的原貌，至於古籍對現今的意義如何，並非其首要關注。因此，教父學給人的感覺是死板乏味的。在歐洲留學時，筆者不止一次聽到其他學系（現代神學、哲學）的學生說教父學者只懂原文卻沒有思考。這些批評不完全客觀，但也代表了部分的外界觀感。另一個局限是過度的「歐洲中心主義」。處理手稿所要求的原文造詣是非常高的，研究者不但要能閱讀，而且也須懂得辨識異文中文法差異的背後意義，這程度並非一兩年的原文課程就能達至的。這語言門檻給歐洲人帶來

天然優勢，因這些乃他們的古語，在學習上容易得多，動力也相對更大，再加上大部份的文獻底本都是收藏在歐洲的博物館，這使過去五十年間至少一半以上的教父學研究都是在歐洲完成的。¹¹在這些因素下，傳統的教父學一直是非常專門且治學嚴謹的學科，但同時也規限了其普及化的可能性。

當代思潮下的教父學

以文獻整理為主軸的教父學研究，在過去二十多年產生了很多的變化。這不是說文獻整理變得不再重要；文獻整理在歐洲地區，尤其是德法兩地，仍是默默地進行，為學術界提供一本又一本經過嚴謹的本文鑑定的原典，而這方面為古典文明乃至基督教神學所作的貢獻是值得我們敬佩及稱謝的。這裏所說的變化，是指在當代不同思潮的互動下，教父學在定義上及方法論上出現了百花齊放的現象。以下會列舉其中三個新思潮，並闡述它們怎樣塑造教父學的新方向。

第一個思潮是「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 範式及不同批判理論的出現。自布朗(Peter Brown) 提出了「古代

4 有關奧古斯丁對馬丁路德的影響，最詳細的研究見於 Hans-Ulrich Deilus, *Augustin als Quelle Luthers: Eine Materialsammlung* (Berlin: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1984)。有關教父們對路德的影響，參 Volker Leppin, “Luther,” in *Luther Handbuch*, ed. Albrecht Beutel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5), 45–49。

5 在路德著作第二集前言裏，路德好友兼改革夥伴默蘭頓寫到：「對奧古斯丁的所有著作，路德常常閱讀並牢牢记著」(*Omnia Augustini monumenta et saepe legerat et optime meminerat*, 載於 *Corpus Reformatorum* 6, 159)；另參 Albrecht Beutel, “Luther,” in *Augustin Handbuch*, ed. Volker Henning Drecoll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7), 617。

6 在他的不同著作中，路德引奧古斯丁多達 1000 次以上，詳見 Deilus, *Augustin als Quelle Luthers* (見註 4)。

7 Jaroslav Pelika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 vol. 1: *The Emergence of the Catholic Tradition (100–600)*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331: “The Reforma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has repeatedly, and to some degree accurately, been interpreted as a movement in which the anti-Pelagian doctrines of Augustine about the necessity of grace were used to attack the anti-Donatist doctrines of Augustine about the mediation of grace.”

8 參 Berthold Atlaner, *Patrologie: Leben, Schriften und Lehre der Kirchenväter*, 3rd ed. (Freiburg: Herder, 1951), 1; Quasten, *Patrology*, vol. 1 (見註 1), 1。

9 有關過去幾十年西方教父學發展的回顧，可參 (1) Charles Kannengiesser, “Fifty Years of Patristics,” in *Theological Studies* 50 (1989), 633–656; (2) Martin Wallraff, “Whose Fathers? An Overview of Patristic Studies in Europe,” in *Patristic Stud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o Mark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atristic Studies*, ed. Briouria Bitton-Ashkelony, Theodore de Bruyn and Carol Harrison (Turnhout: Brepols, 2015), 57–71。

10 其中最重要的三個系列為：(1) 在德國柏林的 *Die Griechischen Christlichen Schriftsteller*; (2) 在比利時蒂倫蒙特的 *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Latina* 及 (3) 奧地利維也納的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有關教父學過去五十年在文獻編纂上的具體成就，可參 Kannengiesser, “Fifty Years of Patristics” (見註 9), 640–647。

11 Wallraff, “Whose Fathers?” (見註 9), 57。

12 布朗在他的很多著作都有提到這個「古代晚期」的概念，最顯著的為 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AD 150–750*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1)。

晚期」這歷史分期，並將教父時期的思想文化發展置在這羅馬歷史的大框架下詮釋後，¹² 這個進路在美國學術界大行其道，¹³ 使教父學開闢了一個新天地。要知道，以往教父主要是被理解為教會的父親 (Patrology 或 Patristics 也由此得名)，隸屬宗教研究範疇。但現在將教父置於「古代晚期」這框架下去理解時，教父的思想行為則不單只屬宗教層面，它更是古羅馬帝國文化及社會現象的一部份，由此教父學就得以擴闊至歷史研究、文化研究、社會學研究等領域。這思潮的另一個領軍人物是依利沙伯·克拉克 (Elizabeth A. Clark)。這位杜克大學的榮休教授，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在其教父學研究中引入不同的社會科學及語言學理論，例如後殖民主義 (post-colonial)、性別議題 (gender studies)，及後結構主義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等等。她於 2004 年出版的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更為這種以批判理論來詮釋教父的進路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她這樣說：「自 1960 年代末，古代晚期研究因與人類學及其他社會科學的相遇而得以活化；我不希望將教父學送回傳統研究的光景」。¹⁴ 經過布朗及克拉克的努力，教父學 (尤其在美國) 變得不再一樣。第二個思潮是來自中國學術界的新興教父學熱。這個熱潮可謂集中於一個教父的研究身上——奧古斯丁。其實奧古斯丁傳入中國可追溯至耶穌會士利瑪竇 (Matteo Ricci) 來華時，¹⁵ 但礙於其濃厚的宗教色彩，一直只受到教會圈子重視。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開始有學人以奧古斯丁作為學術的研究課題。¹⁶ 他們視奧古斯丁為西方哲學家多於教會教父，研究他時較多側重於他的思辯色彩較濃厚的著作，例如討論《懺悔錄》時，會強調卷十對記憶的論述，討論《論三位一體》時，則看重卷十一心靈視覺這些屬知識論層面的討論。¹⁷ 這種「哲學化」的進路是中國學者參與教父學的一大特色。對他們來說，教父之重要性不在其宗教身份，乃在於他們是古代西方文化的奠基者。我在杜平根作研究時，就認識了幾位從國內高等學府過來研究奧古斯丁的博士生。他們全都是哲學背景出身，在德國入讀的也自然是哲學系，而我則是神學系。我們在研討會有美好的交流，私下也成為好朋友，但對奧古斯丁的理解，我們的關注點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有很大的差別。這個中國教父學熱在過去十年間有「爆發式的成長」，¹⁸ 不論出外留學或是在國內大學讀博士課程的，奧古斯丁的研究每年遞增，而且大學間以教父為題的定期交流逐漸形成，而研究進路也由哲學申延至社會學、歷史分析等層面。¹⁹

第三個思潮強調教父學與公共議題的對話。這思潮在澳洲、南非及南美洲等地發展得頗蓬勃。誘因是教父學在當地沒有文化優勢，傳統的文獻分析進路對應不到社會所關注的議題，也難以取得研究項目資助，這迫使教父學者開拓新的研究進路，探索教父學與公共議題互動的可能性。他們雖然並非來自主流傳統學派，但近年所凝聚的力量足以形成一股新風氣。他們強調跨科際研究，所關注的課題多樣，包括危機管理²⁰、奴隸制度與貧窮²¹、地域資源分配²²，及至醫學倫理等等²³。

這種跨科際進路的努力，正好體現於 2019 年牛津教父學國際會議的一個大會主題演講中，²⁴ 就是澳洲教父學者 Wendy Mayer 所主講的 *Patristics and Postmodernity: Bridging the Gap*。有別於傳統的大會主題，這場演講的重點是提倡教父學回應當代議題的必須性，而受歡迎程度是空前的。筆者親身所見，大會禮堂座無虛席，當中更不乏傳統學派的權威學者參與，可見學界中越來越意識到跨科際研究的重要性。

總結

本文上半部分勾勒了教父學由古代至中世紀的發展，並點出傳統進路的優點與局限，下半部分則闡述了教父學的新形態怎樣在當代思潮下逐漸形成。傳統的文獻編纂與分析仍是重要的，但這不再是唯一的研究進路。以上三個思潮，都見證着教父學跨科際的嘗試，由傳統以歐洲為中心及文獻主導的基督教學科，擴大為敏於回應公共議題的人文領域，這實屬可喜的現象。

華人神學在教父學領域的參與不多，礙於語言及研究的門檻，過去我們很快便轉移焦點至經科或當代神學等各個基督教研究中的熱門領域。筆者認為，教父學的轉型可以是我們參與的一個契機。華人神學正面對思想及政局上多變的時代，教父學可以給予我們一個渠道，讓我們將基督教的多元性及公共性展現於世界眼前。

13 Wallraff, "Whose Fathers?" (見註 9), 66.

14 Elizabeth A. Clark,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58–159: "Encounters with anthropology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 from the end of the 1960s onward greatly enlivened studies in late antiquity; I would not wish to return patristics to its traditional disposition."

15 中國學者周偉馳對奧古斯丁在中國的接收作了深入的探討。詳見周偉馳：〈明清奧古斯丁中文傳記〉，《世界宗教研究》2017 年第 4 期，頁 125–135。

16 參夏洞奇：〈奧古斯丁與中國：一段學術上的緣分〉，載《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通訊》(2020 年春)，頁 3；參陳越驊，〈既濟未濟——中國教父學研究的未來〉，《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 50 期 (2019 年春)，頁 77。

17 這方面的代表作可參周偉馳：《記憶與光照：奧古斯丁神哲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

18 參陳越驊：〈既濟未濟〉(見註 16)，頁 69。

19 同上註，頁 78。

20 例如 Pauline Allen and Browen Neil, *Crisis Management in Late Antiquity (410–590 CE): A Survey of the Evidence from Episcopal Letters* (Leiden: Brill, 2013).

21 例如 Chris L. de Wet, *The Unbound God: Slavery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ristian Thought*. Routledge Studies in the Early Christia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18).

22 例如 Susan Holman, "Shape of Water: 'Medicine of Mortality' in Patristic Pastoral Healthcare," paper presented XVI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tristic Studies*. Oxford. 19 August–24 August 2019.

23 例如 Helen Rhee, "Pain at the Intersection of Ancient Medicine and Early Christianity: Paradox of Agency and Insharability," paper presented XVI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tristic Studies*. Oxford. 19 August–24 August 2019; Pak-Wah Lai, *The Dao of Healing: Christian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Medicine* (Singapore: Graceworks, 2018).

24 XVI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tristic Studies*. Oxford. 19 August–24 August 2019.

放眼世界，紮根家鄉

心繫緬甸的 Khin Maung Yee @Khawsiam



2007年至2010年，我得到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的獎學金和參加了領袖訓練計劃，有機會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這個美麗又寧靜的校園裏攻讀神學博士，主修系統神學。我希望完成博士課程，日後能幫助發展緬甸的神學院。

緬甸人在崇基

神學院座立於崇基學院，一個歷史悠久的書院，在崇基學院大門外的兩根柱上寫着：崇高惟博愛，本天地立心，無間東西，溝通學術；基礎在育才，當海山勝境，有懷胞與，陶鑄人羣。這副對聯的意思是視一切人如自己的同胞，視萬物為自己的儕侶。有懷胞與，謂心中關懷着與自己同出生於天地萬民和萬物。

就在這個地方，我碰上來自不同地方、不同宗派、不同背景的同工和同學，大家都繼承了大公的精神，為主工作。三年間，我遇上不少從內地來的同學，當中有對信仰認真和待人親切的年輕人，他領我認識更多他們的朋友。而大家都是從崇基神學院獲助學金的。崇基神學院對緬甸和中國內地神學教育的承擔可見一斑。

緬甸人在神學院

來到崇基神學院，最希望的就是從老師和訪問學者身上學習。他們教懂了我神學的方法論，幫助我在緬甸的處境下，創造和發展自身的神學。崇基神學院的老師對同學們都很友善，同學也非常尊敬老師。這種良好又親密的師生關係令學習事半功倍，也增加了學生的學習動力。崇基神學院的課堂中，有濃厚的討論氛圍，刺激思考之餘，令人回味無窮。

崇基的老師們分別都是相關科目的權威，其中影響我至深的是我的論文指導老師葉菁華教授。他常常和我討論論文，提出具啟發性的問題，引導我對論文辯證作出批判思考；龔立人老師教授我們「基督、教會和靈性」一科。在龔老師的課堂，我找到了研究的突破點。當時，班上大多是香港同學，故此，老師以廣東話授課，有同學自願為我翻譯成為英語，令我非常感動；從林子淳老師的課堂，我認識現代基督教思想家，有助我了解神學研究的趨勢；來自美國的訪問學者葉約翰老師教我們約翰文學；另一位訪問學者 Dr. Susanne Scholz 則介紹了女性希伯來文的聖經研究進路予我，其釋經和閱讀聖經的方法更使我大開眼界。感謝老師們教懂我如何在緬甸處境下理解聖經。

我的論文題目是：「朝向建立 *Ludu* 神學：借鑒評議民眾神學而引伸含意去促成神學意義的響應受苦的緬甸人民」。 *Ludu* 一字緬甸語 *pri dhee ludu*，意思是國家的兒女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country)，也有「受壓逼、疏離、邊緣化的人民」(people who are oppressed, alienated and marginalized) 的意思。

緬甸人在香港

我來香港的首年，有不少地方需要適應，和同房同學作息不同而引起的睡眠問題則令我大為頭痛。同房朋友很是勤奮，習慣讀書至夜深，而我則無法在燈火通明之下睡覺；香港的食物很美味，我都很愛吃，可惜由於我有胃潰瘍，所以面對琳琅滿目的美食，只能眼看嘴勿動，這成為我在香港的重大考驗。



每年的神學院步行籌款及探訪老師都是他最喜歡的活動。





Khin與讀神學的同學互相支持。

在香港的日子裏，我們更失去了一位來自緬甸的好姊妹 Soe Soe Mar。她是一位非常友善的人，因健康問題，須常去醫院做檢查。有一天，她於醫院進行檢查時不幸離世。我們都很傷心，一起為她舉行追思會。她的離世提醒我先知以賽亞和耶穌的門徒彼得的話：「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彼得前書 1:24-25）

還記得有學生運來一尊自由神像，合力置放於大學火車站。這個佇立在火車站，代表着民主和自由的神像，紀念了 1989 年 6 月 4 日一場發生在天安門的學生運動。年輕人對於追求民主和人權的訴求很強烈。這是我留在香港時的重要回憶。

緬甸人建設緬甸

從 1988 年起，我已在緬甸獲按牧，是緬甸循道公會的其中一個牧者。我希望成為一位稱職的牧者，事奉上主和周遭的人，成就教會的大使命，及成為上主的見證人，拯救人的靈魂，把他們從不同的苦難中解放出來，這才是真正的福音。我希望我能夠服侍緬甸北部 (Mizo) 的年青人，我深信神學教育是其中一個解放人民的途徑。在我們國家欽邦 (Chin State) 的 53 個少數民族部落中，不少人因為財政問題不能完成學業，當中不少是神學生；在服侍教會的期間，我也發現教會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願主保守。

緬甸是一個以佛教作為主要宗教的國家，宗教之間常常產生衝突。我致力於促進各宗教和諧共處，參加不少宗教對話以促進和平，建設緬甸；我希望能透過宗教對話宣揚不同宗教的文化，達至和平。最近，我剛完成一項耶佛對話的研究計劃及出版了一本以緬甸語寫成的書，希望可使基督徒和佛教徒互相理解，減少衝突。

我家鄉的神學院 Myanmar Theological College 是建於 1937 年，由英國循道公會建立的，也是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 (ATESEA) 的成員之一。我在那兒執教鞭已經有 14



2018年8月，Khin 參加了由 The Oxford Institute of Methodist Theological Studies 舉辦的會議，期間與恩師葉普華教授重聚。

年，曾任該院教務長及院長，主要教授系統神學、教牧神學、輔導與關懷、亞洲神學、方法論和宗教對話等科目。在緬甸，很多年青人來自不同地方，不同的族群，有着不同的文化、經濟和背景，有些更來自農村。向他們授課絕不容易的，我花了不少時間鑽研教學的方法和策略，多加了解學生背景，以故事形式吸引學生，引起他們共鳴是一個不錯的方法。我也讓他們知道緬甸的政制如何影響少數民族，讓他們關心社會。退休後，我打算透過教會在欽邦發展非牟利學校，教授經濟困難的小朋友學習英語。

緬甸人在美國

2020 年春天，我在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作為訪問教授，為期一個學期，主要教授兩門課。殊不知疫情嚴重，我也被迫留在了美國。這個學期，我主要教授兩門科目：「耶佛對話：再讀佛家和基督教的比喻」和「亞洲神學」。在新型肺炎疫情之下，我在網上進行授課。學生中有亞洲人，也有美國人。他們的思想開放，具批判思維，向他們授課是我的一大挑戰。而我發現，對於先進國家的學生來說，要他們憑空想像第三世界的處境，還是有點困難，以致未能充份了解並討論。盼望日後，大家有機會有更多交流。

因新型肺炎，我滯留於美國多月，今天終於可以起程回到我所愛的緬甸，見我的家人，繼續事奉我的國民。

Khin Maung Y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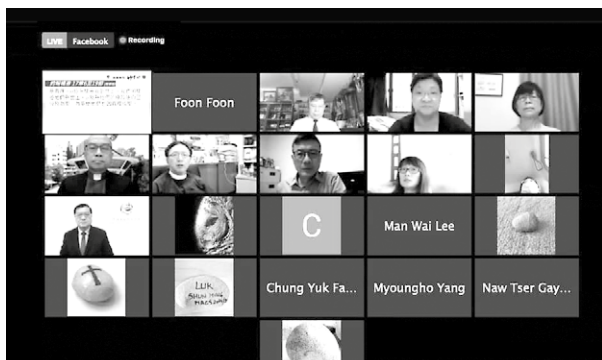
寫於在韓國轉機準備回國

2020 年 7 月 21 日

編按：在仰光隔離了約一個月後，Khin 終於在 8 月 19 日回到家鄉。他透露緬甸循道公會委任他成為巡迴牧師，在緬甸西北部 Varpui 教會事奉，他亦將會在 Tahan Institute of Theology 中任教授。

（訪問、翻譯和整理：李廣平）

崇基學院神學院 「在線」結業崇拜



在政府要求社會人士保持社交距離並實施限聚令下，本院於5月21日首次於網上舉行結業崇拜，透過網絡於Facebook專頁進行網上直播。網上總瀏覽人次超過600人，當中包括崇基學院院長方永平教授，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林崇智牧師，訪問學者葉約翰教授，客席老師盧松標先生及梁明浩博士等等。結業崇拜由王家輝牧師主持，卓潔貞校友任司琴，陳日穎同學、李敏慧同學、歐陽曉鏡同學及蕭藹琦同學分別擔任普通話及英語即時傳譯。部份讀經和進行傳譯的工作人員均透過網上進行。現場工作人員和參加師生必須佩戴口罩，入聖堂前均需量度體溫，並且保持至少1.5米距離。

證道：「我離開之後」

龔立人教授祈禱後，校董姚健偉牧師、黃宇軒同學及黃永健同學讀經後，由邢福增教授證道，講題為「我離開之後」。六年任期內最後一次以院長的職分於結業崇拜證道，邢教授以約翰福音17章6-19節的經文，向大家作最後告別。他笑言「時候到了」，並借此機會感謝同工，在不同位置彌補他的不足，實現合一及大公精神；

他感謝崇基全人給予他機會，為大家服務；他也感謝太太的付出，讓他可以專心服侍。他寄語大家，即使在香港社會及教會所經歷的巨變中，也不要被世界改變，懷着盼望，依然活出真實。未來，他期望回到研究的崗位努力，繼續發表論文和著作。

獻石禮

崇拜設網上獻石禮，由葉約翰教授在線主持，參加者於鏡頭前舉起小石子，象徵把小石子獻上。本年度準畢業生及尚未獻石的校友模擬於洗禮盆上獻上一顆自己喜愛的小石，小石象徵畢業生的「同在」，也代表日後師生的禱告中，會繼續記念畢業生。往後於合適的日子，本院也會再次邀請校友回校親自獻上小石。最後，崇拜由陳衍昌牧師差遣及祝福。

崇拜完結後，上屆學生會會長黃宇軒同學及卓麗精同學頒發2019-2020年度最佳教學獎予任卓賢博士，而梁若璋校友則頒發梁若璋獎學金予卓麗精同學。另外，本院致送紀念品予鄭漢文博士，感謝他過往多年的服侍。並祝福他開展人生的新篇章。



2020年 「破天荒」「破紀錄」 「網上」「另類」步行籌款

總籌款超過 131 萬元



感謝上主！

本院在疫症蔓延期間，取消了大部份活動，包括傳經講座、課堂體驗週和週一加油站等。為顧及安全，一年一度的步行籌款延至5月31日舉行，原定節目嘉年華會及盆菜聚餐則取消，以避免人群聚集。今年步行目的是為「崇基神學教育基金」籌款。

步行籌款兵分兩路，以直播形式，由任志強博士及本院校友何嘉明小姐主持，領現場觀眾經驗「不不同

行」的「同行」，只須安坐家中收看在線的直播節目，一邊感受現場氣氛，一邊飽覽中大山城景色，再一邊支持「崇基神學教育基金」。

崇基線

節目開始後，由鄭漢文博士、副院長關瑞文教授和王珏博士於崇基學院介紹各景點歷史和特色，包括：崇基學院的校聯、豎立於火車站前的女神像、未圓湖、崇基教堂及小橋流水等。

中大線

邢福增教授連同葉菁華教授和白德培教授領直播觀眾到達二橋作介紹，隨後抵達新亞書院，分別介紹中大書院制與聯邦制及其變化；葉教授則介紹圓形廣場及孔子像。

及後，邢教授於烽火台及百萬大道講解，同場加插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劉義章教授之精彩講解；葉教授則返回崇基學院神學院講解本院聖堂的建築及內部設計的特色。

直播室

直播室方面，也特別邀請了龔立人教授、黃慧賢教授及任卓賢博士前來分享，陣容鼎盛。

頒獎典禮

步行籌款籌備小組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頒獎典禮，以答謝參加者。邢福增教授在接受支票移交儀式後，發表簡短的致謝。他感謝各神學院同行者在疫症期間對本院的支持，亦特別感謝今年步行籌款籌備小組全人的應變能力及新穎的籌款方式，為本院帶來歷史上首次網上步行籌款活動，並打破去年籌款紀錄，令他在任期內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是次步行籌款為本院「破天荒」「破紀錄」「網上」「另類」步行籌款，截至五時三十分為止，共為本院籌得當日總數：\$1,315,528.00，錄得參加者 56 位，並贊助者 885 位。詳情可透過以下途徑收看重播：

步行籌款 Facebook 專頁

<https://m.facebook.com/dsccwalkathon/>

* 如仍有同行者欲捐款支持本院神學教育，可以透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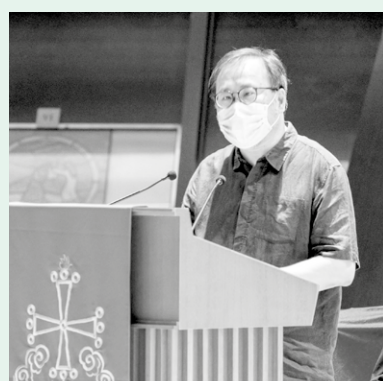
劃線支票：崇基學院或銀行轉帳：
恒生銀行 283-174001-001（請保留入數紙或儲存轉帳紀錄，提交方法請參步籌網頁）



紀念六四31周年 泰澤祈禱會

6月4日晚，「紀念六四31周年泰澤祈禱會」在崇基學院神學院聖堂舉行。受限聚令影響，大會不設現場報名，出席人數限於170人。出席者進場前必須量度體溫，佩戴口罩，並以酒精消毒雙手後方可進場。祈禱會在本院 Facebook 專頁直播，共錄得188次個轉載分享並超過1.2萬人次收看（截至10時）。

祈禱會先以泰澤詩歌詠唱，頌讀詩篇18章1-6節、25-30節及彼得前書5章5-11節，並由中文大學歷史系何曉清教授、龔立人教授及邢福增教授分享信息。



信息分享

龔立人教授

龔教授在分享時指出，今日青年人於當下香港的經歷使他們和31年前在天安門的抗爭者的經歷連結。兩代人同樣追求一個公義、自由和民主社會，拒絕向一個說謊和倚靠暴力的政府乞求，不計較用自己身體抵抗荒謬並受到不同程度的侮辱、暴力對待和檢控。兩代人也因着對公義和自由實現的盼望，在不同時空結連。而他特別指出，紀念流血的苦難者就是見證着人不放棄追求公義、自由、真相和復和。

何曉清教授

何教授分享自身的經歷及有關六四的人和事，至今她仍然不願意忘記那些堅持爭取公義、自由和民主的青年人。她深信無權者的權力是可堅持的，自由的種子已經播下，終會開花結果，無懼風吹雨打。維園的燭光令她感到自己並非孤身一人悼念，雖然今年無法在維園悼念，但她相信無法奪走人們心中的燭光。她鼓勵大家，達致光明需要戰勝黑暗。



邢教授分享時提醒大家悼念六四不是選擇，卻是一種堅持。他指出三十一年來，有人選擇遺忘、裝睡、謊言…，他勉勵仍然在努力拒絕謊言、仍然堅持記憶及活出真實的人，在看不到黑暗盡頭的時候，祈求看見上主而來的微光，並從上主處得到堅持紀念的勇氣和力量。因為活着，是堅持人的價值與尊嚴。

分享信息後，會眾在靜默時點燃手上的小蠟燭，作默念禱告。參加者以簡短禱文向上主祈求，並詠唱「Kyrie 上主，求你憐憫」。唱頌主禱文後，由王家輝牧師作出結束祈禱。他向生命的主祈求，讓各同行者能堅持追尋良善、信實、公義和真理。

如欲重溫祈禱會內容，歡迎瀏覽本院面書專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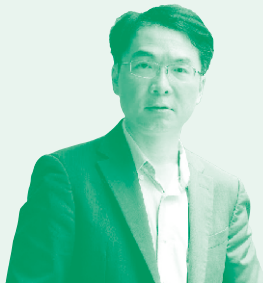
崇基神學院 院長順利交接



本院邢福增教授於7月31日完成六年院長任期，2020年8月1日起由葉菁華教授接任。當天為同工退修日，因新冠肺炎疫情，辦公室同事透過網上進行視像會議。會議尾聲，加插了一項「議程」。原來，教職員及同學準備了一個別出心裁的錄影片段給邢教授，內含各人心聲。影片中各人感謝他六年的服侍，並送上深情說話，同事們也預先邀請了邢師母分享過去六年的點滴，令人動容。此外，同事安排了一個「象徵式」的交接儀式，由邢福增教授移交「神學院長傘」、辦公室鎖匙及留有歷任院長簽名的聖經給葉菁華教授，各在家工作的同事一同見證。葉教授簡短分享，讚揚神學院優秀的教職員團隊是令人願意承擔此職的重要原因，盼望日後繼續共同努力。

邢福增教授卸任院長後仍繼續擔任本院教授。本院感謝邢福增教授過去六年的服侍，願上主繼續保守他和家人，讓他繼續透過教學和研究，造就教會，祝福社會，為主作工。





院長的話

2020.8.1

懷着戰兢的心情，今天接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的職分。

執筆之際，外面正急風暴雨；天氣如此，社會如此。

在急風暴雨的環境，教會仍要以宣講和行動，實踐基督使命、見證天國福音——比起風和日麗的時間，如今教會的使命實踐顯得更加重要。

教會為他者存在，神學院為教會存在。我們透過培訓專職牧者、裝備信徒領袖、促進神學研究，服事教會，並因而（藉信徒作鹽作光、行公義好憐憫）祝福社會，以及（藉科際交流與合作）貢獻學術界。本院將繼續推行課程重構，使有形及無形的課程更有效和適切地實現神學教育的任務；也會尋求機會，讓我們的課程可服事遠近各地的粵語、華語、英語群體；並且會發展可服務教會與社會的研究與知識轉移。當然，我們要繼續鞏固教師團隊以及拓展財政資源。

前面難免充滿挑戰，可是我並不孤單。今天收到不少祝福和鼓勵的說話，為此感謝上主，也感謝各位支持、代禱。為着全面支持本院的眾神學校董、滿有智慧和學養的教研團隊、優秀而充滿幹勁的行政及其他同工、展現各樣恩賜的同學、在各崗位忠心事主為主發光的校友，以至香港及世界各地眾多的同行者與支持者，獻上感恩！

急風暴雨，驚濤駭浪，唯靠上主操舵：

「求救主為我操舵，去經過苦海洪波；
大風浪撲面而來，多礁石，堪慮隱災；
惟主有南針海圖；懇求主為我操舵。」

（「求主操舵歌」，《普天頌讚》619首）

葉菁華

2020年8月1日

（院長的話亦已於本院網站上載）



（相片拍攝 Lawrence OP, "Christ Calms the Storm"）



卸任院長的話

假使院長原來不像你預期

2020年7月31日——是期盼已久，六年院長任期的最後一天——終於來到了！只是，從沒預料到，這一天，竟在如此這般的情況下臨到。由於疫情第三波，大學近日再度實施在家工作，寂寂的校園，空空的辦公室，跟近月令人窒息的白日陰霾交錯在一起。人生，完全在我們預期之外，以這樣的方式，來到了這一點……

回首六年前，在沒有任何預備下，接下了這擔子。當然，那時更沒可能預知，2014年9月以後的香港社會及教會，會經歷如斯劇變……記得在就職崇拜中，曾以「苦竹」十字架述志。（註）六年間走過之路，所經歷的一切，都在預期之外，在考驗自己，如何在時代中尋索召命，揹起自己的十字架。

記得早前有一位同學跟我說，不明白我為何常將「不情願」掛在嘴邊，對此很不以為然，因為這跟她對「院長」的期望，有着極大落差。是的，我似乎真的沒有成為許多人所「預期」的院長，或因此令某些人失望（希望不會「絆倒」別人）。或者，令這位同學感到不安的，是眼前這位「院長」好像常表現出「不甘心」作主僕人的委屈，沒有留下美好的見證。我想起保羅曾說：「我若甘心做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給我了。」（林前9:17）是的，將我與「院長」的身分連在一起的，是責任，而當中確有「勉強」與「不得已」的糾結在其中。人生一直活在張力與拉扯之中，這六年之間尤甚。這是真實的我，毋須掩飾，也不想戴上任何面具。不過，捫心自問，六年的「被院長」，並非「不甘心」，而是在拉扯中學習「勉強自己甘心」與「甘心自己勉強」的功課。如今，總算畢業了。是否合格，只得留待上主評分。

與此同時，也得承認，要學習如何面對「院長」這身分，以及伴隨的一切……也許，常把「落任」掛在嘴邊，也在提醒自己，毋須眷戀。這一切本來就不屬於我，全屬意料之外的插曲。面對某些稱許與掌聲，人容易沉醉其中，唯有認定自己的本相與限制，回到本該屬於自己的位置，繼續作上主手中的小筆，研究、寫作與教學，仍是我所領受的召命。

六年間，當然面對許多批評。因着學者的志業，這些日子以來，常不能自己地作出一些選擇與堅持。誠然，這難免為個人，甚至神學院帶來挑戰。或者，常把「落任」掛在嘴邊，是跟那些不喜歡我的人說：時候到了，我會卸下院長的職分。於我，只會向上主交帳。

七月起，開始為「撤離」院長室預備。偶爾有人問我，「卸任」在即，心裡會否有所不捨？坦白說，卸任最大的捨不得，是要離開這相對較寬敞的辦公室（同時是我的研究室）。六年以來（除了安息年），這裡仍是我研究及書寫的地方。坦白說，要堅持研究及寫作，仍得面對各種現實拉扯，但我卻樂在其中，因為唯有這樣，才感受到那真實又不被改變的自己。然而，六年來，雖然已經克制，但藏書量仍一直增加。如今，面對「大屋搬細屋」的苦惱，必須學習斷捨離的功課。幾經艱辛，終於完成「撤離」壯舉。這陣子，在「空空如也」的房子裏倒數日子，深深感受到佛家言「空」，緣起性空，有空才能立之義理。

早前在路上，遇到一位智者。匆匆之間的交談，略有所悟……智者問我，如何看待這六年？是的，走過時間，一直都在預期之外。在事前，甚至每一刻的當下，既無法預知，所踏出的每一步，又何曾知道？想起最喜愛的

中國神學家趙紫宸在 1950 年初寫的小書《我被逮住了》所言：「人不能把上帝逮住，乃是上帝把人逮住了；上帝把人逮住，人乃在不可講不可傳的經驗裏覺悟到上帝的實有」。在不預期之中，如何發現及感悟上主實有，在誠惶誠恐中憑信踏出每一步，相信仍是一生之久要學習的功課。

如今，這位不似預期的院長已走完該走的路。感謝多年來崇基神學教育的同行者，感謝許多為曾在禱告中托住我的朋友，感謝一直提醒及包容我的同工，還有默默支持及付出的妻兒。深信大家會一如既往地支持崇基神學教育，特別是新任院長葉菁華教授。上主的工作委實奇妙，在看似不預期之中，存在心裏，反覆思想，總令我們感到讚嘆驚奇，出人意外。

是的，這是一個完全不像我們預期的世界，所以更需要堅守召命與本分。不期然想到一首流行曲——「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的歌詞：「當一切完全不像你預期，才明白不可心死，沿路再走幾千公里，要做最好的你。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才明白不要放棄，沉住愛反覆的心理，風雨不會沒了期，終於會等到夢寐。全城在變遷，不減你是你。」我們活在一個不似預期的世界之中，也需要在其中作出各種或輕或重的選擇，求上主幫助我們，能夠認定召命與志業，曉得堅持怎樣的信念與價值，以及能承受的代價，選擇生活，作怎樣的基督徒（人）。

想起一件封塵舊事：2004 年時開始撰寫一篇學術論文，只寫了二千多字，便因舉家從長洲遷入馬料水而停筆，結果一擱十六年，誠為人生一大憾事。如今，立志在卸任後重拾舊歡。文章是探討趙紫宸對罪與惡的反省，

十六年來，時勢之惡，遠超預期。此時此刻，再續前緣，又有何啟悟與深意？為免再荒惰延誤，謹公開此事，以作鞭策。

傳道者嘗言：「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傳十二 12b）。如今，我盼望能全心再踏上這無盡旅途，面對不可知的未來，求主賜我健康的身體，看要看的書，言說所追求的真實。我的禱告是：求主賜我信心、勇氣與盼望，繼續「敬畏上帝，謹守他的誠命」，因為這是「人當盡的本分」（傳十二 13）。

你的同工

邢福增

2020 年 7 月 31 日

註：「竹的特色是四季長青、有節及空心。常青表示持續的力量、有節是需要氣節、空心即虛己的倒空，這是我向上主祈求的。再者，一枝竹的力量有限，但將多枝竹紮在一起，便能夠抵禦各樣壓力，不易折斷……用竹重構成十字架，融合了中國文化與基督教信仰，這也代表了我所領受的召命。十字架是受苦與承擔，人世間被視為愚拙的，甚至想要拆除的，卻是認信上主必勝的榮耀標記與盼望。苦竹是我的心聲，也是提醒。」〈就職述志〉。



基督教研究中心

消息

2020年6月2日至7月3日期間與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合辦「漢語神學研究」[系列一]線上講座，由9位知名教授主講各個專題並與參加者深入討論：

第一講：

6月2日(二)「從漢語神學研究看宗教比較及對話」：賴品超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參與人數共301位。

第二講：

6月5日(五)「何謂神聖？思辨的、神秘的與俗世的視角」：謝志斌教授(同濟大學哲學系教授)，參與人數共246位。

第三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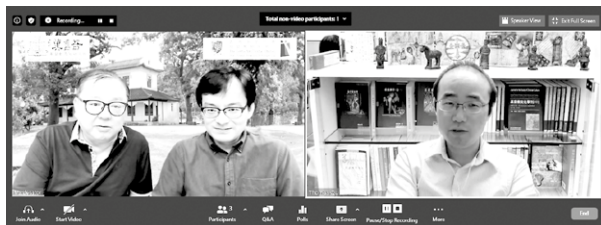
6月8日(一)「破碎的冠冕：北森嘉藏與莫爾特曼的苦難之思」：洪亮博士(中國政法大學宗教與法律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參與人數共有285位。

第四講：

6月12日(五)「維滕堡的夜鶯—作為聖詩詩人與音樂家的馬丁·路德」：姜林靜教授(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德語系副教授)，參與人數共有261位。

第五講：

6月16日(二)「關於光的古典美學原則：從柏拉圖到格羅塞斯特」：宋旭紅教授(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參與人數共202位。



第六講：

6月24日(三)「宗教與當代『私民社會』」：李向平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參與者達203位。

第七講：

6月26日(五)「對話詮釋學視域中的漢語聖經研究範式探討：自艾香德以來」：梁慧小姐(浙江大學基督教與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博士生導師)，參與者達190位。

第八講：

6月30日(二)「漢語神學運動可以繼續下去嗎？——從人文主義角度來設想」：林子淳教授(同濟大學兼任教授)，參與者共201位。

第九講：

7月3日(五)「尼采是誰？——尼采的宗教批判與漢語神學研究的未來」：瞿旭彤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此為最後一講，共333人參與。

深切悼念戴智民牧師——

一位學養和修養兼備的同工

陳佐才法政牧師

前崇基神學組主任



戴智民牧師初在崇基任教神學時，源自西方，部份的傳統保守神學正抓着香港教會和大部份神學界。崇基神學工作者是稀有的一羣，探討着新的神學研讀方向，重視神學處境化，神學研究絕不能與現實脫節。着重學術水平，深入傳統的同時，不忘因應本土文化及處境，活化傳統。戴牧師認同這方向，並形容為「一片滿有豐富應許的土地」。¹

這是充滿動力的遠景，但當年的現實是這片土地對教會和學生吸引力不大。神學院學生人數不多，修讀舊約的學生也少。戴牧師感嘆說：「映照在我們眼前的，與其說是一個美麗的園圃，毋寧說是一片雜亂的叢林。」²

戴牧師並無氣餒。他的學養和修養一步一步發揮作用。在舊約的教學中，他認真和踏實地發掘舊約信仰群體的多元處境和回應，帶出舊約中信仰生活的多元和豐盛，更點明信仰群體中公義的特質和不可或缺性，一點一滴地整理這雜亂的叢林，給崇基神學追尋的遠象帶來真實和堅實的基礎，更給早前偏重新約和離地

的，囿於個人感受的聖經詮釋，帶來新的和突破性方向。結果是修讀和深造舊約及釋經學的學生多了，而舊約也理所當然地與新約同等，同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礎。在一次退休前的訪問中，他說：「在最近的十年中，每年均有學生研寫有關舊約聖經的論文……甚至有其他同事向我投訴，因為同學們花太多時間在舊約聖經的研讀，因而忽略了其他學科呢！」³

戴牧師的教學生涯中，許多師生互動的故事，仍深印學生腦海裏，例如曾有學生交出學術水平不足的功課，戴牧師即評說：「這只是主日學的料子，請再做。」他也曾在師生討論中，着意地詢問學生除讀聖經外，有沒有多讀中國典籍，例如易經、抱朴子……前例促進學生學習的深度，後例則提點學生研讀的廣度，特別是中國學生自己的文化，對學生的影響，自然達至「深度與廣度齊飛」，而因舊約的被重視，也自然走向「舊約和新約一色」了。

戴牧師作為崇基神學教育的一員，他的學養和教學，使崇基神學的遠象增加了清晰度和實質感，而崇基也給他英雄可用武之地，彼此造就，相得益彰。難怪他在退休訪問中，吐露了心中話：「我覺得我對教會的貢獻就是在神學院教書。」⁴實在來說，能把自己的專業興趣和自己從事的工作融為一體，非常難能可貴。戴牧師是其中的表表者，他是得益人，崇基神學教育和就讀的學子們更是。

戴牧師，我們都深切地感謝你，懷念你！

1. 江大惠：《崇基神學四十年：1963-2003》（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組，2003），頁 76。

2. 同上書，頁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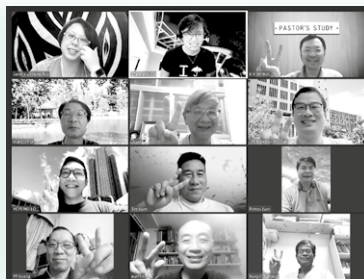
3. 同上書，頁 265。

4. 同上書，頁 264。

編按：獲香港崇真會和陳佐才牧師同意轉載。

校友會消息

8月2日晚，本院校友會舉行線上會議。剛履新葉菁華院長列席參與。適逢當天為院長生辰，與會者同賀。



神學院消息

2020年8月1日起，由葉菁華教授接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一職，關瑞文教授及白德培教授分別為負責學務和外務之副院長。卸任邢福增教授則繼續擔任本院教授。願上主繼續保守本院，賜福院長和團隊。

葉菁華院長就職崇拜謹定於10月4日（日）下午3時30分在崇基禮拜堂舉行。惟鑑於疫情反覆，就職崇拜暫定只有網上直播，敬希見諒。最新安排及網上直播請到：<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tc/event/francisyipinauguralservice>。

老師消息

邢福增教授

邢福增教授原訂5月應台灣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邀請，赴台作學術演講及訪問，因疫情關係，延至12月。

5月至7月期間，邢教授先後為香港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基督中心堂佐敦堂、幸福台、榮光敬拜事工、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六一七團契、馬鞍山靈糧堂、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神學及牧職部社關小組、循道衛理會中港關係小組、使命公民運動、基督教機構協會、金巴崙長老會香港區會、循道衛理會社會事務關注小組等，主講網上專題講座。

6月，〈未聽到的中國聲音：文革時期福音廣播聽眾來信所見的「第二社會」〉（與國斐合著），刊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7期。

白德培教授

7月2日，白德培教授獲蘇黎世大學歷史系的邀請，進行網絡課堂及研討會，主題為中港關係的歷史。

黃慧賢教授

7月29日，香港中文大學舉行教與學博覽會，黃教授和馬輝洪先生於教學法環節中發表聯合演講，題為：「從藝術創作和展覽中探看女性主義神學教育」。

王曉靜博士

8月中，王曉靜博士與中文大學合約結束，自9月1日起，將加入挪威VID Specialized University的Intercultural History of Christianity研究團隊。

校友消息

校友高國雄牧師（'08 MDiv）於2020年8月1日起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校牧。願主賜福他的事奉。

恭賀

葉漢浩教授獲文學院頒發2019年度傑出教學獎，以表揚其卓越的教學表現。

謝甘霖同學（'16 MDiv; PhD）和陳淑琳同學（'18 BD）的兒子謝倚恆於6月9日出生。願上主賜福，讓小朋友在愛中健康成長。

哀悼

著名新約學者鄧雅各教授（Prof. James D. G. Dunn）於2020年6月26日安息主懷，在世生活80載。他退休前一直於英國德倫大學（University of Durham）神學及宗教系任教，以提倡「保羅新觀」聞名。2003年，他應邀主講本院第七屆傳經講座，主題為「在記憶中活著的耶穌」。他亦是本院前任院長盧龍光牧師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本院全人向其家人致深切哀悼，也願鄧雅各教授與上主同在，得享平安。

本院講師劉耀生博士（'08 MACS, '12 MDiv; '16 PhD）父親劉健徒先生於7月29日主懷安息，享年87歲。安息禮拜於8月15日在基恩堂舉行安息禮拜。

校友吳浩輝先生（'09 MATS）於7月6日去世，享年56歲，安息禮拜已於8月1日於基督教國際神召會舉行。他是基督教安輔堂的執事，忠心服侍教會超過30年。

願上主賜離世者永恆的安息，並使其家人和朋友得安慰。